

这是在中国历史上都曾书写**浓重色彩**的一群人，
他们潜伏在特殊战线，有共同的名称——**中共特别党员**

林峰
著

旧中国上流社会的中共特别党员

潜伏
在精英圈



潜伏 在特殊 战线

林峰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潜伏, 在特殊战线 / 林峰著.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0.11

ISBN 978-7-5317-2524-4

I. ①潜… II. ①林… III. ①中国共产党—模范共产党员—生平事迹 IV. ①D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3006号

潜伏, 在特殊战线

作 者 / 林 峰

责任编辑 / 李庭军

装帧设计 / 语墨弘源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电子信箱 / 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

开 本 / 720×1020 1/16

印 张 / 22

字 数 / 300千字

版 次 / 2011年2月第1版

印 次 /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 38.00 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2524-4

目录

CONTENTS

1 第一章 “笔抵万军”的著名报人邵飘萍

邵飘萍，中国近代新闻史上著名报人、《京报》创办者、“五四运动”实际发起人。他以报刊为阵地，向反动派发起猛烈抨击。成为中共秘密党员后，他的报纸成了党的“喉舌”，有“一支笔抵过千万军”之誉。他是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被人称为“新闻全才”。因直言敢谏开罪直奉军阀，于1926年被当时的北洋政府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于北京天桥。

33 第二章 从帝制祸首变成“特科”的杨度

他是“君主立宪”的真正追随者，为清政府晚期变革，实行君主立宪摇旗呐喊，拥戴袁世凯称帝；他是孙中山和黄兴相识的介绍人，好朋友；后来，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上的转变，被特科发展为中共秘密党员。受特科派遣，他潜伏在杜月笙的身边，利用这个身份为共产党传送情报。他时而阔谈于高堂，时而藏匿于山林，时而又栖于豪门，时而靠卖字聊以度日。他死后，周总理为其证明身份。他就是具有传奇色彩的杨度。

目录

CONTENTS

60 第三章 长期潜伏的戏剧艺术家金山

金山，原名赵默，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民艺术家、戏剧教育家、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电视剧艺术委员会主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在革命年代，作为我党的秘密特工，长期潜伏在文艺界，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

87 第四章 特科出身的名出版家胡愈之

在革命最低潮的时候，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是中央特科的骨干，为党获取了很多重要情报；他是我国著名的出版家，最早将著名记者爱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翻译成中文并秘密出版，最早组织出版了《鲁迅全集》；他曾积极营救“七君子”，并到桂系和南洋做统战工作；1948年，毛泽东预计解放战争还将进行二年，他帮助修改为一年；他——就是具有传奇色彩的胡愈之。

124 第五章 敢叫板蒋介石的“共谍”王昆仑

王昆仑，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1922年参加国民党。1926年任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政治教官，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秘书长，因不满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参加反蒋民主运动，多次质问蒋介石。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为争取国民党上层人士做了大量工作。

目录

CONTENTS

152 第六章 功勋卓著的情报专家阎宝航

他是张学良的终身挚友，又是宋美龄的
身边红人；他是蒋介石眼中的“能人”，却
又是何应钦的“眼中钉”；他是国民党元老
陈诚、于右任等的好朋友，却又与周恩来的
私交频繁；在国民党元老陈诚眼中，他“最
不可能是共产党员的人”；在他领导的地下
党成员的眼中，他又是可寄托生命的赤子。
他就是阎宝航——中共最杰出的战略情报专
家！一个最早获得德国进攻苏联和日本偷袭
珍珠港情报的人！

187 第七章 与“魔鬼”打交道的大亨卢绪章

当卢绪章换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后，
许多人惊呆了！于是不断有人写信给陈毅市
长，“举报”卢绪章是国民党四大家族之一陈
果夫的红人，中统、军统特务是他家的座上客，
由国民党组织部长吴开先亲自介绍加入国民
党的特别党员……其实，卢绪章在1937年就
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创办广大华行，随后积
极扩展广大华行业务，为中共筹得了大量的
活动经费。他与国民党高官及中统、军统特
务关系密切，被誉为“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220 第八章 “百变刺客”炼成的精英华克之

华克之，曾策划刺杀宋子文、汪精卫，
是国民党特务机关通缉的对象，被誉为“百
变刺客”，他的人生写满了惊险、刺激、传奇。
1939年秘密入党。在与军统、中统等的斗争中，
他曾用过几十个别名。他化装过商贩、记者、
教授、龙井茶种植园主、国民党高级将领和

目录

CONTENTS

华侨巨商等各式人物，出入于香港、广州、上海、南京等地，周旋于日、美、英和汪伪、国民党的深宅大院从事秘密情报工作。他出生入死，营救同志，智取军火、地图，为党屡建奇功。

256 第九章 “七君子”中的秘密党员沙千里

文化名人沙千里，抗战时期与沈钧儒等人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抨击当局的做法，被国民党政府视为“眼中钉”。1936年他与邹韬奋等6人以“危害民国罪”被捕，这就是历史上的“七君子事件”。在社会各界的营救下，“七君子”终于获释。沙千里秘密投向共产党，继续与国民党进行坚决斗争，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276 第十章 隐蔽战线的历史学家翦伯赞

翦伯赞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是著名的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作为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硕果累累。蒋介石想听他的课，他毫不客气地“下课”婉拒。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他在文化教育战线赫赫有名。他曾加入国民党，参与北伐战争。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他坚决反蒋，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他在秘密战线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激烈的斗争。

301 第十一章 淡泊名利的“红色牧师”董健吾

董健吾，被人誉为“红色牧师”。他，早年加入特科，利用牧师身份作为掩护，从事情报工作，出生入死；他，在上海开办了

目录

CONTENTS

我党历史上第一所收养革命烈士遗孤的幼稚园，培养了大批革命后代；他，抚养了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多年，并将他们送到苏联留学；他，是宋庆龄和我党联系的纽带，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他，安全护送著名美国记者斯诺访问延安，后者写出了著名的《西行漫记》；他，由于和组织失去联系，建国后长期在上海当按摩师为生，淡泊名利，从来不向党和政府邀功请赏。

第一章 “笔抵万军”的著名报人邵飘萍

他，毫不畏惧，敢于发文讨伐袁世凯的的卑劣卖国行径，敢于揭露北洋军阀的卖国丑行和镇压学生的暴行，敢于直面张作霖、吴佩孚的淫威；他，交友甚广，与革命先烈孙中山先生和李大钊先生等情深笃厚，与冯玉祥将军、郭松龄将军肝胆相照；他，忧国忧民，以手中的笔作为武器，向当权者和外国列强发起挑战，以追求国家强大，民族兴旺，百姓安康。他就是，“一支笔抵过十万军”的著名报人邵飘萍，一个早期的共产党员。

寒门才子 倒“袁”先锋

邵飘萍（1884～1926）原名镜清，后改为振青，笔名飘萍，浙江东阳人。邵飘萍的曾祖父邵棕球是当地有名的书生，性格刚烈，性情耿直，在当地很有名望。祖父邵煜光早年走失，靠奶奶将邵飘萍的父辈养大，邵飘萍的父亲邵桂林是个寒门秀才，以教书为业，膝下四子四女，邵飘萍最小，加上祖母，家庭有十多个人吃饭，生活过得非常艰辛。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社会动乱，东阳当时社会不太平，于是很多东阳人纷纷迁往附近的兰溪、建德等地谋生，邵飘萍的父亲邵桂林带领全家迁到离东阳不远的金华。

邵飘萍5岁随父启蒙，在父亲的教导下，邵飘萍学习刻苦，很快成了当地有名的“神童”。6岁读书，10岁能作文答对。14岁的邵飘萍在父亲的督促下，前往杭州参加科举考试，考取了秀才第一名，主考官考虑年幼容

易骄傲，把他降为第10名。1903年，邵飘萍考入浙江省立第七中学，1906年，年仅21岁的邵飘萍，在父亲友人的帮助下，赴杭州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18岁入浙江高等学府，在校期间受梁启超思想的影响，开始为《申报》撰稿，被聘为该报特约通讯员。毕业后邵飘萍回到金华任教，仍然继续为《申报》撰稿。

邵飘萍年轻时积极参与救国救民的运动，辛亥革命前夕，不断接受进步思想的熏陶，立志“新闻救国”。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布《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一时间，各种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涌现。邵飘萍的办报欲望被点燃，他难以抑制心中激动的情绪，毅然辞去令人羡慕的教师职务，只身来到杭州。在考察完当时杭州的所有报纸之后，他找到《汉民日报》报馆，拜访了这家报纸的社长杭辛斋，二人一见如故，邵飘萍很快便加盟《汉民日报》，并被该报聘为主编，实现了自己“新闻救国”的愿望。

在《汉民日报》工作期间，邵飘萍发挥了他的强项，针砭时弊，抨击地方官僚，讨伐“袁贼”，遭到袁世凯的痛恨。一次，袁世凯手下从屋顶向报社投弹，邵飘萍他们提前得到情报，早有防备，在楼梯、窗户、阳台等地方铺垫了被褥、棉花和布料等，避免了爆炸的发生。1913年3月，当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刺客暗杀后，邵飘萍立即指出“有行者，有主使者，更有主使者中之主使”，矛头直指袁世凯。他抨击当局“呜！内务部。呜呼！内腐部……人但知强盗可怕，不知无法无天的官吏比强盗更可怕！”，并称“报馆可封，记者之笔不可封也。主笔可杀，舆论之力不可斫”。

1913年8月10日，由于邵飘萍等人的言论，浙江都督朱瑞以“二次革命”嫌疑罪逮捕邵飘萍，封闭《汉民日报》馆。获释后，邵飘萍仍毫不畏惧，身骑大白马，回乡看望父老乡亲。之后，他于1914年腊月东渡日本，就读于浪人寺尾亨为中国人办的政治学校。在日本期间，邵飘萍登门拜访孙中山先生，并结识了一些革命党要人（如黄克强、陈友人、陈英士、黄庸白等）和一些新闻届的挚友（如张季鸾、胡霖、潘公弼、杨虎公、徐佛等）。学习期间，他和潘公弼等三个同学创立《东京通信社》，为京、津、沪、

汉等城市著名报纸写东京通讯，重点报道留日学生和爱国华侨在日本开展反袁活动的情况，同时揭露日本政府的侵华野心。

1914年8月21日，《朝日新闻》发《中国新议定书》六条，说中国已经同意作为日本的被保护国，第三国不得侵害中国。否则，日本将采取“临机必要之处置”。这样一来，中国就被日本控制了，日军要入侵中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对中国而言，危机就在眼前，邵飘萍立即将日本媒体报道的消息电发国内，提醒国人奋起反抗。时局果然不出所料，不久，日本就趁德国无暇东顾，对德宣战，声称替中国收回被德国占领的国土，派大批军队在山东半岛龙口登陆，强占青岛和胶济路全线。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提出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作为支持袁世凯称帝的交换条件。袁世凯为了达到称帝的野心，居然准备承认。这个肮脏的交易虽然在极端秘密地进行，但是，还是被嗅觉灵敏的外国媒体获悉，并公开发表。邵飘萍最早向国内及时提供报道，予以揭露。李大钊也为“留日学生总会”撰写《警告全国父老书》，呼吁全国民众团结抗日，挽救濒于危亡中的祖国。两人为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一揭一呼。“二十一条”被披露后，海内外华人同声声讨袁世凯。邵飘萍继续组织留日学生利用报纸、杂志、集会等方式抗议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1915年5月9日，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接受“二十一条”，全国掀起了反对“二十一条”，打倒袁世凯的强烈呼声。当年12月，袁世凯登基称帝，上海新闻界电邀邵飘萍回国，加入倒袁斗争。他回国后，担任《申报》、《时报》主笔，仅1916年的前五个月，他便以“阿平”署名，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36篇社论、134篇时评，对袁世凯进行猛烈的抨击。

《申报》骨干 智斗军阀

《申报》是当时上海的一张大报，1872年4月30日在上海创刊，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在1949年5月27日才停刊，前后共有77年的历史，《申报》的创办人是英国商人美查。1907年，上海金融家席裕福买下了申报馆，从

此，申报馆由中国人掌控。1912年，史量才成了申报馆的大股东，对《申报》进行了重大调整，此后，该报很快成为当时上海发行量最大，同时影响力最广的一份报纸。

1913年3月开始，邵飘萍就开始为《申报》写稿，至1916年6月，他在该报撰写的稿件共有70多篇，在《申报》的“北平特别通讯”栏内大胆揭露北洋军阀的丑行。这期间他发表了著名的时评《预吊登极》：“京电传来，所谓皇帝者，不久又将登极。呜呼！皇帝而果登极，则国家命运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极矣！但二月云云，尚须多少时日，各处反对之声势，再接再厉。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呼！记者是以预吊！”1916年6月，袁世凯在举国讨伐声中死去，邵飘萍被史量才聘为《申报》驻京特派记者，以加强中央政情的采访和北京新闻的报道。从此，邵飘萍开始了京城十年记者的生涯。

当时的北京报纸不是很发达，邵飘萍一到北京就进入了角色，每天要给《申报》发回大量的新闻专电。原先，上海的《申报》、《时事新报》的北京专电，每天不过一二百字，在他的努力下，《申报》每天的北京专电增加到500字，甚至达到两三千字。为了让读者了解较为详细的时局信息，他还配合专电，随时向《申报》寄出内容较为详尽的“北京特别通信”。邵飘萍反映北京时政的“北京特别通信”因为有很强的可读性，而且结合时局，视角独特，写法上不拖泥带水，很快吸引了读者，成为了《申报》占领市场的一大法宝，《申报》的发行量很快超过了1.4万份。

为了采写到有价值的新闻，邵飘萍凭着对新闻事业的执着，会采取各种办法，动用各种手段实现。如：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33个国家先后卷入战争。在是否参战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显得犹豫不决，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北洋政府决定参加英、法、俄的“协约国”，对抗德、奥、土的“同盟国”，但迟迟不敢宣布。作为记者的邵飘萍深知此条信息对国民的重要性，为了采写这条新闻，紧急赶往总理府，被拒之门外，但他看到挂有总统府车牌的车辆可以自由进入总理府，于是，他通过朋友弄来了一辆挂有总统府牌照的车辆，直抵

总理府。他请总理府守门官呈报段祺瑞要求段总理接受采访但遭拒。该守门官说，这三天段总理不会客，就是他的秘书、侍从也不接见。邵飘萍于是掏出钱来贿赂门卫，请他“通报段总理邵飘萍来采访”。

令人意外的是，段祺瑞很爽快答应了采访的要求。邵飘萍开始间接探问，但段祺瑞就是不谈战事。于是，邵飘萍又单刀直入提问，说三天之内如在北京走漏消息，愿以泄露“国家秘密罪”接受法律的严惩，并立下“军令状”，段祺瑞再也无法拒绝，就把政府决定参加协约国对同盟国宣战的决定和细节，以及首先调在法华工 15 万，参与协约国修建工事等情况予以透露。邵飘萍得到这个特大新闻，迅速赶往电报局，用密码将这个新闻发往上海的《申报》和《时事新报》，《申报》和《时事新报》迅速出版发行“号外”，上海迅速轰动。四天后，报纸到达北京，北京也轰动起来，但这已经超过了邵飘萍与段祺瑞的三天期约，且消息从上海传入北京，段祺瑞没能掌握此次泄密与邵飘萍的证据，也就不敢贸然处置邵飘萍。邵飘萍正是利用超人的胆识与北洋政府斗智斗勇。

段祺瑞政府名为参战，实为逐步壮大自己的势力。对德国宣战后，段祺瑞政府不但没有收回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反而进一步向日本出卖中国。1918 年 5 月，段祺瑞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根据协定，日本军队可以在北满洲国等“军事行动区域内”设置谍报机关，中方要向日方提供“军事所要之地图和情报”，日后当日本进犯苏俄时，中国要派遣军队，还要置于“日本军司令指挥之下”。此外，段祺瑞政府还将中国的铁路、电讯、森林做抵押，大肆向日本政府借款 5 亿日元。段祺瑞政府的种种罪行，邵飘萍看在眼里，他充分发挥自己的“笔杆子”，利用报纸作为媒介，不断揭露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

邵飘萍刚到北平不久，除了为《申报》写稿子外，还觉得应创办一家通讯社，以此来改变外国通讯社“任意左右我国之政闻”的状况。于是 1916 年 8 月，邵飘萍成立了新闻编译社。新闻编译社的主要业务是采编北京的新闻以及选译部分外电，通过手写或者油印的方式，每晚 7 时左右向北京各报馆及外国驻京记者以及上海的《申报》等油印发稿。发稿次数为每

日一次，每次几十份，由雇员骑自行车将之分送给报馆，并向外埠各报邮寄。新闻编译社不受制于军阀和政客，表现出相对独立性，因此也经常受到当局的掣肘和压迫。在张勋复辟时，编译社就被强行停止出刊数日。

创办《京报》 “五四” 干将

1912年—1928年，中国处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下，军阀头子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各统治了4年。这些军阀头目都有各自的军队、地盘和靠山。他们荼毒百姓，卖国求荣。当时的首都北京，是政治中心。各派政治势力为了掌握话语权，影响舆论，往往以“津贴”的名义资助报馆经费。报馆得到某派势力的资助，自然替他说话，攻击对手。更有甚者，有的军阀干脆自己出钱办报。当时北京大大小小70多家报纸，大部分都有政治背景。如《北京时报》是段祺瑞的喉舌，《黄报》接受的是张宗昌的资助，《顺天时报》的后台是日本人等。它们随政局沉浮，无一贯的政见和主张。没有“报格”是当时北京许多报纸的共相。

在北京的两年，邵飘萍深深感到要有自己独立的报纸，不依附于任何权势集团，独立地发言，独立地报道，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民众，以反映民众的呼声，做民众的喉舌，表达自己的心迹。于是，1918年10月5日，他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创办了著名的《京报》。他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指出：“时局纷乱极点，乃国民毫无实力之故耳，……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京报》日出版两张，邵飘萍依靠办《汉民日报》时的经验，参考在日本、京沪各大报纸的版面设计，出版的报纸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它的一、四版为广告，二版分评论、特别记载、国内外要闻诸栏目，三版为各省新闻、北京琐闻、政府命令、以及“显微镜”栏目等。

创刊初始，邵飘萍与公弼两人独揽报纸的采编工作，报纸出版一个月，销量增至4000份，当时北京报社、通讯社很多，其中人员复杂、良莠不齐，

鱼目混珠，各靠后台老板维持报业。有的甚至专干敲诈勒索，有的人则挂名领干薪。北洋政府为了控制舆论界，往往给报社分等级，“赠送”宣传费加以收买。各报社所领款额少则五十元，多则六百元。对于这种行为，邵飘萍恨之入骨，在《京报》上大肆抨击，揭露一些报社、通讯社为了取得“津贴费”，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丧失了新闻业公正立场。《京报》创刊不久，很快在读者面前竖起了爱国反帝的旗帜，受到了广泛好评。

无党无派、不以特殊的权力集团为后盾、主张言论自由，以此定位的《京报》很快就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声望倾动一时。《京报》受新思潮的影响，又代表着新潮流，不久便成为了“五四”运动前的强大舆论阵地，有力地推动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1917年元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对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坚持“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方针，聘请了当时提倡思想革命的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邀请激进民主主义者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兼教授，胡适、刘半农、杨昌济等知名学者都云集北大，北大一下子由一个封建思想、官僚习气浓厚的学府变成了一个思想开放、学派林立的阵地。1918年10月，邵飘萍促成北大成立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聘他为导师，正为《京报》奔波的邵飘萍不顾劳碌，坚持每周去讲两小时的课，这也开创了新闻教育的开端。在首批学员名单上，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杨晦、谭植棠等赫然在列，邵飘萍影响力之深远，可见一斑。

1918年10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法、日、意等组成的“协约国”打败了德、奥等组成的“同盟国”。1919年1月18日，“协约国”在巴黎凡尔赛宫举行“和平会议”。作为“协约国”的一员，北洋军阀派出了专使陆徵祥（外交总长）、顾维钧（驻美公使）、王正廷（南方军政府代表）、施肇基（驻英公使）和魏宸祖（驻意公使）出席巴黎和会。专使迫于国内民众的强大压力，在和会上提出了取消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特权，废除日本与袁世凯秘密签订的“二十一条”，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但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心不死，这些合理的要求都被帝国主义予以拒绝。

1月21日，日本政府无视中国专使关于废除原与德国签订的青岛条约，

由中国恢复所有权的正当要求，悍然以退会相要挟，妄图维护已经取代德国在华权益的既成事实。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目的，曾在和会上提出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协约国”管理，日、英、法强烈反对。基于联合反苏的利益，美国对日本作出妥协，与英、法等国一道，不顾中国人民的强烈抗议，无理拒绝了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正当权益。当时，主持外交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都是亲日分子，竟然准备在“和约”上签字。当消息传到国内，全国人们愤然，纷纷痛斥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4月30日，巴黎和会正式决定把以前德国在山东抢占的土地、铁路、矿山及其他一切特权归日本继承。5月1日，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完败的消息见诸报端。上海《大陆报》最先透露，称中国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租借之对日外交战争，业已失败”。5月2日，北京《晨报》发表了总统徐世昌的顾问林长民所写《外文警报敬告国人》一文，沉痛写道“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此噩耗，前两日，仆即闻之。今得任公电，乃证实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

邵飘萍白天奔走各社团谋救亡，晚上撰写《请看日本朝野与山东问题》、《国民对待外交之准备勿以空言塞责》的评论文章。谓：“日本因山东问题，其内阁、其贵族院，其国民团体，皆一致强词夺理，为示威之运动。我国民、我政府、我国之议会团体，对之也有动于衷否乎？欲夺他人生命财产以自肥者，其气概且如此。然则吾人为国家生命自救灭亡起见，安得不一致奋起以与决一生死也哉！”

5月3日，北京各高校学生决定当晚7时在北大聚会。当晚，开会时间还未到，来自北大、高等师范、中国大学、朝阳法专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政法专门学校、医药专门学校等学校的学生超千人聚集北大法科礼堂。作为《京报》社长、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国民杂志社顾问的邵飘萍发表演说，他悲愤地报告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和原因，又具体分析了山东问题的性质和当时的形势。他高呼：“现在民族危机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挽救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

邵飘萍富有战斗性，具有很强号召力的高呼感染了在场的每个人，同时，也带动了大家愤慨的情绪。

新闻学研究会的会员和国民杂志社的社员高君宇、谢绍敏、张国焘及各高校代表夏秀峰等纷纷慷慨陈词。当晚，与会者做出了如下决定：（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9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同时推举代表到各国公使馆，陈述对于青岛之民意及决心。深夜，邵飘萍回到报社撰写活动的新闻《北京学生界之愤慨》以及评论《速息内讧》，报道“五三晚会”。

当晚，邵飘萍又调整《京报》版面，要闻栏在“国民一起奋起”的大标题下刊登《国民外交协会之决议》、《学生界之宣言》，广告栏登出《国民外交协会特别大会》一文作为通知各界诸君出席在中央公园召开的“五七”国民大会，讨论救亡图存的办法。

5月4日上午，邵飘萍又马不停蹄赶往堂子胡同国立法政专门学校，去参加北京各校学生代表在那里举行的集会。大会临时公推北大代表孟真先生为主席，邵飘萍报告了巴黎和会经过和我国外交形势，经过一小时左右的悲愤发言，主席当场宣布各代表迅速回学校召集同学下午一时在天安门集合，赴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示威，抗议巴黎和约。下午一点多钟，十几所中等以上学校的三千多学生，挥舞白色小旗，高举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宁为玉碎，勿为瓦全”的标语牌在天安门前集合，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受到了北洋军阀的镇压，大批学生被捕。5月5日，全北京的学生罢课，强烈抗议政府对学生大打出手的无耻行为。6日，学生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并通电全国，组织散发传单，讲演等活动，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北洋政府迫于学生运动的压力，迅速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的职务。

“五四运动”自爆发后在全国迅速发展，邵飘萍站在历史的高度，审时度势，不但利用《京报》这块阵地大篇幅报道“五四运动”，而且还针